

否定之否定^①:刘易斯模型与托达罗模型比较与改进

——兼论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选择

楚永生,王云云,高 颀

(南京审计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

[摘 要] 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为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转移提供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政策选择,究其原因:其一,刘易斯模型是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初期阶段的理论,而托达罗模型是适合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特定阶段的理论;其二,刘易斯模型是从宏观经济结构转换视角,分析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城市现代部门转移的过程,称为“过程论”,而托达罗模型是从微观个体决策视角,分析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决策行为,称为“决策论”;其三,刘易斯模型侧重点是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而托达罗模型侧重点是解决城市失业问题。两大理论模型的共同缺陷是在解释农村劳动力转移中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特殊的国情和制度因素,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复杂性和阶段性。因此,基于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阶段性,从决策主体的时间、土地产权和户籍制度等变量因素对托达罗模型进行改进,并提出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选择。

[关键词] 刘易斯模型;托达罗模型;二元经济理论;劳动力转移;城镇化;剩余劳动力;刘易斯拐点

[中图分类号] F27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3114(2019)05-0103-09

一、引言

城乡劳动力流动是劳动要素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的有效途径,也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城市化道路的必然选择。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认为^[1],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边际生产率较高的城市工业部门和边际生产率较低甚至为负的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会从边际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源源不断地向边际生产率较高的城市工业部门流动,直到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吸收完毕,发展中国家就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这一论断被称为“二元经济理论”或“刘易斯模型^②”。自该模型诞生以来,围绕着该模型的修正和质疑一直没有停止过,尤其是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从发展中国家城乡普遍存在失业的前提出发,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并不是城乡边际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而是取决于预期城市获得较高收入的概率和失业者风险的权衡,并据此提出“托达罗模型”^[2]。该模型强调城乡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和城市较多的失业问题,主张抑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发展农业生产,走农村城镇化道路。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开出了截然不同的“药方”,并引发了国内外学者广泛的争议。故

[收稿日期] 2018-12-1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BJY001);教育部青年项目(17YJC630005);江苏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2017ZDAXM011);江苏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项目(2017ZDIXM103);江苏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2018SJJZDA135);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APD)

[作者简介] 楚永生(1970—),男,山东菏泽人,南京审计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劳动与社会保障,邮箱:120094@nau.edu.cn;王云云(1995—),女,河南济源人,南京审计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劳动经济学;高颀(1994—),男,河北平泉人,南京审计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劳动经济学。

① 刘易斯模型与托达罗模型被称为“二元经济理论”,国内学者王学真、刘英群等认为,刘易斯模型与托达罗模型都是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但结论和观点有很大不同,政策建议截然相反,故托达罗模型是对刘易斯模型的否定^[3-4]。但笔者认为,托达罗模型不仅意识到了刘易斯模型的缺陷,同时也是对刘易斯模型的批判继承和发展,即否定之否定。

② 刘易斯模型最早由刘易斯提出,其后经过费景汉、拉尼斯等进一步完善。尽管费景汉和拉尼斯对刘易斯理论完善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并没改变刘易斯理论的精髓。因此,笔者把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理论或模型,简称为“刘易斯模型”。

此,笔者尝试分析两大经典理论模型产生的背景、适用性以及缺陷,针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复杂性和阶段性进行理论模型改进,并提出我国劳动力转移的政策选择。

二、“过程论”:经典“二元经济理论”提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是,这些发展中国家普遍是工业基础薄弱的农业国,经济结构单一,生产力水平低,人民生活贫困^[3]。因此,这些国家首要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摆脱贫困,发展经济。然而,针对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摆脱贫困的理论研究,却非常罕见。美国杂志《经济发展与文化变化》(1952)在创刊词中指出:“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讨论仅仅停留在个别观点上,这些讨论充其量只是列出了一份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但没有系统的因素表……即便仔细考察现有文献,也找不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理论,更找不到学者们就哪些问题才对发展中国家研究具有重要性的一致意见。我们看到的仅仅是一片充满贫困恶性循环、变革障碍以及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之类说法的原始丛林”^[4]。

基于这一研究背景,刘易斯一方面考察了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城镇化历程。在1850年,主要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总数大约只有4000万人,而到1950年则增加到4.49亿人,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工业部门达到4亿多人^[5];另一方面他又从发展中国家“落后因素列表”中发现了传统农业部门生产方式落后,剩余劳动力过多,生产率十分低下,从而为发展中国家找到了摆脱贫困的钥匙。据此,刘易斯在英国《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了《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1954)一文,标志着“刘易斯模型”的诞生。

刘易斯模型最大贡献不是其“二元研究方法^①”和“剩余劳动力”概念,而是他提出的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源源不断向现代城市部门转移的过程^[6],故称为“过程论”。这一过程可分为“古典阶段”和“新古典阶段”,其转折点为“刘易斯拐点^②”,见图1。

在图1中,横轴代表劳动力供给和需求数量,纵轴代表劳动力价格或工资率。 M_1N_1 、 M_2N_2 、 M_3N_3 表示现代工业部门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曲线, SS 曲线为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的供给曲线。在 SH 阶段,意味着传统农业部门存在大量的显性剩余劳动力,劳动力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即只需支付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 W_1 ,就可以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给,称为“古典阶段”。在 HS 阶段,则意味着随着农村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有限供给,称为“新古典阶段”,其转折点 H 为刘易斯拐点。后来的经济学家拉尼斯和费景汉进一步完善了刘易斯模型,把“新古典阶段”划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隐性劳动力转移时期。在 HG 阶段,意味着农业劳动力边际生产率大于零,劳动力转移开始引起农产品总量的减少,农产品价格上涨,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开始争夺劳动力,从而推动现代工业部门非熟练劳动者的工资上涨。第二时期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枯竭时期。在 GS 阶段,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不再由“生存收入”决定,而是由劳动边际生产率决定,且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逐步趋于相等,“二元经济结构”消失。如图1中, G 点之后的部分,农业部门劳动力的工资上升很快。

刘易斯模型从其诞生以来,一直被作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灵丹妙药”。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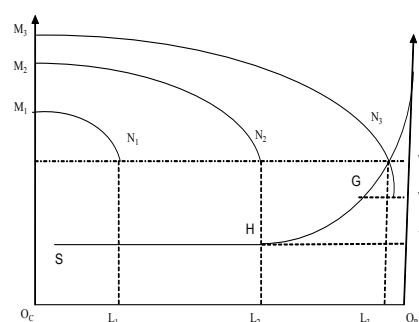


图1 刘易斯模型

① “二元研究方法”被称为“二元研究范式”,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首次把经济分为传统或生存部门与资本主义部门,并把劳动生产率作为主要的研究变量。刘易斯这一二元经济分析理论,后被称为“经典二元经济理论”。后来的经济学家,如费景汉、拉尼斯、托达罗等沿用了这一分析范式,这些理论也统称“二元经济理论”。

②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发展中国家从“古典经济条件”向“新古典经济条件”跨越的转折点。

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实践,这一模型暴露出以下局限性:其一,农业劳动力同质性假设。与其他二元经济理论或模型一样,刘易斯模型前提假设是农业劳动力同质的。但是,这与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实际上流出的是教育程度不同的异质性劳动力现实恰恰相反。由于存在劳动力的异质性,这意味着必须对刘易斯模型劳动供给曲线进行改进,如周清杰的‘Z’字形供给曲线^[7]、杨国才的向右上攀升阶梯状折线^[8]、刘勇的向上弯曲转折曲线等^[9]。其二,农业部门发展的停滞或恒定状态假设。刘易斯模型认为,在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没有完全转移到城市现代部门之前,农业部门发展处于停滞或恒定状态。这一假设一方面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不相符,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同时,农业部门会不断积累资金,且生产能力和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另一方面这一假设所描述的经济增长过程也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忽略了农业部门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对工业发展的作用^[10]。其三,工业部门技术进步的中性假设。刘易斯模型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会带来利润和资本积累的不断增长,而资本积累又成为工业部门不断扩张和吸纳更多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源泉,并引发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但是,这种技术进步是不会改变资本与劳动投入比例关系,即技术进步的中性假设。显然,这与经济运行的现实不相符。通常来说,随着工业部门的扩张和产业结构调整,工业部门技术进步会导致对人力资本积累较高的技能型劳动力需求增加。如果从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人力资本成本约束以及稀缺性出发。那么,工业部门必须提高工资水平才能雇佣到合格的劳动力,这意味着原有劳动需求曲线斜率变大,从而也改变了资本与劳动的组合比例关系。其四,实际收入差距动因假设。刘易斯模型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根本动因是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实际工资收入差距,而实际工资收入差距又取决于两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差异。在这里,刘易斯模型把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决策完全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而忽略了家庭、社会心理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当城市存在失业和就业风险的情况下,刘易斯模型将面临无法给出合理解释的尴尬处境。

三、“决策论”：“二元经济理论”批判继承

20世纪70年代,刘易斯模型所提出的理想工业化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出现了过度损害农业而发展工业的情况。与此同时,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导致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以及城乡之间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显然,这些现象一方面与刘易斯模型基本假设相矛盾,另一方面该理论本身也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因此,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发表了《欠发达国家的劳动力迁移模式和城市失业问题》和《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提出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决策模型,简称“决策论”^[11-12]。在这里,托达罗模型既沿袭了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分析范式,同时也认识到刘易斯模型的缺陷并进行了相应改进。该模型表示为:

$$R_t = Y_u(t) \cdot \pi_t - Y_r(t) \quad (1)$$

$$Q_t = f(R_t) \quad f' > 0 \quad (2)$$

在式(1)中, Q_t 为 t 期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劳动力数量, R_t 为 t 期预期城乡收入的差异, $f' > 0$ 表示农村劳动力迁移是城乡预期收入差异的增函数;在式(2)中, $Y_u(t)$ 为 t 期城市实际工资, $\pi(t)$ 为 t 期就业概率, $Y_r(t)$ 为 t 期农村实际平均收入,也是劳动力迁移的机会成本。假如城市不存在失业,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就业概率 $\pi_t = 1$ 。那么,农村劳动力迁移的行为决策就取决于城乡实际收入的差异。托达罗模型表明,城市即使存在大量失业现象,只要劳动者预期迁移城市获得的收入大于农村实际平均收入,劳动力就会由农村向城市迁移,见图2。

在图2中, D_M 是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需求曲线, D_N 是现代工业部门劳动需求曲线,横轴 $O_M O_N$ 表示社会总劳动力供给量。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农业部门的工资为 W_N 时,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就业量为 $Q_N O_N$ 。假如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稍高于 W_N ,这意味着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就会不断向工业部门流动。假如无论

农业部门还是工业部门工资高低能够随劳动力供求灵活变动,那么伴随着农业部门向城市工业部门劳动力转移,农业部门劳动力工资也会随之上升,当农业部门工资与工业部门工资相等,即农业部门劳动需求曲线与工业部门劳动需求曲线交于均衡点E,会实现两大部门的充分就业状态,均衡工资为 W_E 。农业部门均衡就业量为 $O_N Q_E$,而工业部门均衡就业量为 $O_M Q_E$ 。但实际上,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往往具有刚性,如果城市工业部门实际工资为 W_M ,农业部门工资为 W_N ,即使农业部门劳动者愿意接受工资为 W_E ,也必然会导致城市存在大量失业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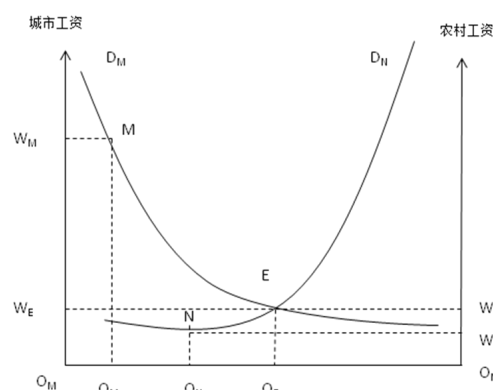


图2 托达罗城乡劳动力转移模型

托达罗模型是针对刘易斯模型的缺陷批判和继承基础上提出的。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城乡劳动力转移,该模型也暴露出以下缺陷:其一,“个人理性”假设。尽管托达罗模型考虑到城市失业因素,但其基本假设仍离不开个体理性假设,即“经济人”假设。但是,事实上,城乡劳动力流动微观基础是家庭理性经济决策行为,这种决策是在保证家庭基本生活和获得最大化收入之间的一种风险-收益组合,而不是单纯的个人理性决策。其二,没有考虑“非经济”因素影响。托达罗模型将劳动力流动视为一种受比较利益驱使的理性经济行为,实际上没有考虑“非经济”因素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13]。考虑到劳动力流动的“非经济”因素影响,农村劳动力不能仅局限于“经济人”假设,而应是“复杂人”假设。其三,没有考虑劳动力流动制度障碍和市场分割问题。托达罗模型暗含实施迁移行为的劳动者永远居住城市,这明显与中国的现实不相符^[14]。由于户籍制度和市场分割,农村劳动力流动大部分是临时性务工。同时,劳动者就业主要在非正规部门,其就业工资水平远低于城市正规部门,也不能享受城市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从而出现大量农民工季节性迁徙行为,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四、比较与改进:中国城镇化“二元经济理论”应用

刘易斯模型与托达罗模型是劳动力转移的两大经典理论,其共同点:一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发展经济学的奠基性理论之一,也刘易斯模型与托达罗模型的理论基础。该理论从产业角度将发展中国的经济系统分为以传统生产方式为主的农业部门和城市中以制造业为主的现代部门。刘易斯模型揭示了在无限劳动力供给下传统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逐步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的过程,而托达罗模型则分析了城市中存在失业状态下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城市部门转移的个人决策机制。二是理性“经济人”假设。刘易斯模型与托达罗模型都是建立在劳动者理性“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的。刘易斯模型强调城乡劳动力实际工资的差异是劳动力转移的动因,而托达罗模型强调城乡预期收入的差异,很明显它们都是基于劳动者经济理性的考察,而忽略非经济因素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三是城乡劳动力同质性假设。托达罗模型意识到城市存在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且农村劳动者进入城市首先在非正规部门就业,但没有对其原因进行探讨。这是因为托达罗模型与刘易斯模型一样,都没有考虑城乡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的差异,尤其是在教育、技能、经验等方面的差异所带来劳动者就业领域的不同,并由此会造成的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四是忽视第三产业的存在。由于刘易斯模型与托达罗模型受时代背景限制,加之其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基础,使它们更多地关注了发展中国家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之间的关系,而忽略了第三产业的作用,尤其是忽略了第三产业对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贡献。

刘易斯模型与托达罗模型的差异表现在:一是理论背景差异。刘易斯模型是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它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初期,经济结构单一,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且存在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托达罗模型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提出的,它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特定阶段,

而这一阶段出现了城市大量失业且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并存的现象。二是分析视角差异。刘易斯模型是从宏观经济结构转换的静态视角来分析通过实现工业化促成从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的转换,而实现这种转换的必然趋势就是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托达罗模型是从微观个体决策行为来分析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决策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预期收入差异越大,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动机便越强。三是理论侧重点差异。刘易斯模型针对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战略,来摆脱经济结构单一和贫困问题,其理论侧重点是解决二元经济结构和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问题;托达罗模型针对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城乡均衡发展战略,来解决城乡经济发展失衡,其理论侧重点是解决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城市失业问题。四是政策含义差异。刘易斯模型政策含义是强调了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必要性,同时强调城市化与工业化的紧密结合,避免了城市化滞后和过度城市化问题。与此相反,托达罗模型政策含义是控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以减少城市失业,同时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综合开发,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就地就业。

刘易斯模型与托达罗模型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 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转移现象,但也暴露出两大理论模型本身存在的局限性。国内学者伍向文、朱熠等针对两大理论模型暗含的劳动力同质性假设,提出应从文化程度和劳动技能差别对托达罗模型进行改进^[15-16];柯荣住、李富有等针对两大模型暗含的劳动力自由流动假设,指出转轨经济国家的户籍制度、福利制度、工资歧视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一定程度上隔离了城乡经济联系和要素的自由流动^[17-18]。鉴于此,陈会广、秦雪征、钟水映等分别从户籍制度、农地制度、社保制度等制度变量对托达罗模型进行了相应拓展和修正^[19-21]。

以上这些学者针对托达罗模型局限性的拓展和改进基本上是拘囿于托达罗模型框架内的修补,并没有考虑到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阶段性和复杂性,蔡昉、刘传江等曾提出中国城镇化的“两过程、三环节”假说^[22-23]。建立在市场理论基础上的托达罗模型,其成立的基本条件是农业人口非农化与农村人口城镇化同步完成,这与我国劳动力迁移过程存在较大不同。朱要龙针对这一现象提出了土地依附效应,并将城镇化过程重新分解为:农业退出、城市进入和农村退出三个阶段,与此相对应,个体决策行为分为乡城流动、城市留居和城市落户^[24]。这意味着,针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复杂性应从决策主体变化、短期和长期以及制度变化等多种变量对托达罗模型进行改进。

1. 农业暂时退出阶段。在这一阶段,农村劳动力只是短时间离开土地,农忙或城市无工可做时其会重新返回农村,收入包括务农收入和务工收入,劳动力流入城市动机是获得个体或家庭收入或收益的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短期流动决策依据是预期城乡净收入的大小,托达罗模型改进为:

$$NR_1 = \int_{t=0}^n \{ [\pi(t)Y_u(t) - Y_r(t)] - [C_u(t) - C_r(t)] + PR_g \} e^{-\rho t} dt \quad (3)$$

$$Q_1 = f(NR_1) \quad f' > 0 \quad (4)$$

在式(3)中, NR_1 表示农业暂时退出阶段劳动者离开农业生产到城市务工预期城乡收入净贴现值, $Y_u(t)$ 和 $Y_r(t)$ 分别表示这一阶段劳动者在城市务工和乡村农业生产的平均工资, $\pi(t)$ 表示这一时期在城市中找到工作的累积概率, $C_u(t)$ 和 $C_r(t)$ 分别表示劳动者城乡生活成本, P 表示家庭人口的数量, PR_g 表示家庭成员从事农业生产获得的家庭收入或收益, Q_1 表示这一阶段农村到城市务工的劳动力流动规模, $f' > 0$ 表示农村到城市务工劳动力流动规模是预期净收入差异的增函数,劳动者预期城乡收入差异的净贴现值越大,劳动力到城市务工规模越大。在这一阶段,一方面农村存在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劳动者流动距离较近且可随农忙返乡务农。这样,农村劳动力暂时退出农业生产不会影响农业的产出和收益,而城镇务工成本也仅是劳动者离开家庭的心理成本和交通成本。因此,这一阶段农村劳动力流动更适合用刘易斯模型的劳动力存在无限供给来进行解释。

2. 农业长期退出阶段。在这一阶段,农村劳动者及其家庭将长期退出农业生产,其收入主要来自城市的务工收入且常年留居城市,但是农村劳动者仍保留土地产权,并形成“进城能打工,退守能种田”的自

我保护机制。在这一阶段,农村劳动者及其家庭迁移城镇的决策取决于家庭效用或福利的最大化,托达罗模型改进为:

$$NR_2 = \int_{t=0}^{\infty} \{ [L_n \pi(t) Y_u(t) - Y_r(t) + PW_{us} + PW_{rs}] - [L_u C_u(t) - L_u C_r(t) + L_u C_{us}(t)] \} e^{-rt} dt \quad (5)$$

$$Q_2 = f(NR_2) \quad f' > 0 \quad (6)$$

在式(5)中, NR_2 表示在农业长期退出阶段农村劳动者及其家庭长期留居城市的净效用或净福利贴现值,这一贴现值越大,农村劳动者及其家庭留居城市的规模越大。 L_n 表示农村家庭劳动力数量, $Y_u(t)$ 和 $Y_r(t)$ 分别表示这一阶段劳动者在城市务工和乡村农业生产的平均工资, $\pi(t)$ 表示这一时期在城市中找到工作的累积概率, P 表示农村劳动者家庭人口的数量, W_{us} 表示农村劳动者进入城市留居获得的家庭福利改善,包括教育、医疗服务和生活环境改善等, W_{rs} 表示农村劳动者家庭保留土地产权获得的土地福利, $L_u C_u(t)$ 和 $L_u C_r(t)$ 分别表示农村劳动者城乡生活成本, $L_{us} C_u(t)$ 表示农村劳动者长期留居务工所支付的制度成本,包括劳动者融入城市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因户籍因素造成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城市福利制度的排斥等。学者邹一南认为,农村劳动者虽然面临户籍制度管制带来的市场分割和城市福利排斥等影响,但是“城市进入-城市留居”仍然是改善其家庭在农村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的重要手段^[25]。在这一阶段,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从农业中长期退出的条件是净福利贴现值大于或等于零,而满足这一条件的基本因素是城市务工收入能使劳动者及其家庭生活水平高于留居农村。这也意味着,为获得更高劳动报酬留居城市的劳动者必须不断提高其人力资本积累水平。

3. 农村退出——城市融入阶段。在这一阶段,农村劳动者及其家庭将完全放弃农村土地产权或者一次性出售土地产权,由此将农村户籍转为非农业户籍,其全家迁移至城市,其工作和生活完全市民化,即城市融入。在这一阶段,农村劳动者及其家庭将失去了土地的产权收益和保障功能,直接面对城市内部户籍制度的制度成本,其农村退出-城市融入的决策依据是预期非农化城市定居带来的家庭福利或效用大于保留土地产权的农业退出家庭福利或效用。据此,托达罗模型改进为:

$$NR_3 = \int_{t=0}^{\infty} \{ [L_n \pi(t) Y_u(t) - Y_r(t) + PW_{us}] - [L_u C_u(t) - L_u C_r(t) + L_u C_{us}(t)] \} e^{-rt} dt \quad (7)$$

$$Q_3 = f(NR_3) \quad f' > 0 \quad (8)$$

在这一阶段, NR_3 表示在农村退出-城市融入阶段农村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完全非农化所获得净福利的贴现值。式(7)与第二阶段的式(5)相比较,缺少了 PW_{rs} ,这意味着农村劳动者及其家庭失去了土地产权的收益和保障,同时, PW_{us} 表示农村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可获得城市生活福利,由于农村退出-城市融入的非农化会使农户获得城市福利增加(如获得城市居民失业培训、低收入补助、失业救济等),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补偿农户非农化而导致的土地产权损失。此外, $L_u C_{us}(t)$ 表示农村劳动力城市就业的制度成本,由于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城市融入也会减少城市就业的制度排斥成本。基于以上因素,农村退出-城市融入对农村劳动者及其家庭来说也是一种较为理性的选择。在这一阶段,农村劳动者及其家庭愿意放弃农村土地产权的原因是融入城市获得的居民福利和社会保障能补偿非农化土地产权损失,而这一条件的实现则取决于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和户籍制度的完善。

五、借鉴与启示: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选择

城镇化是城镇经济发展吸引农村居民进城务工、进城定居,并进而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分享城市文明成果的过程。当然,城镇化绝不是以农村劳动者短期进城务工的人数或规模为标准,而是农村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的市民化,通常用城市化率来衡量。截至2017年底,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为58.52%,与发达国家(如德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城市化率80%以上还有较大的差距。城镇化既是推动我国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也是衡量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志。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市化不同发展阶段指导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典理论,其理论本身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城乡劳动力流动的规律,但也应看到两大模型理论的局限性。基于我国城镇化过程三阶段的托达罗模型改进,本文提出如下完善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选择。

(一)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消除与户籍相关的差别待遇

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城市融入的制度障碍,而户籍制度本质上是依附于其上的各种福利、政策以及相应管理方式^[26]。在城市中存在两种福利:一是户籍福利,包括就业保障、子女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具有一定竞争性的公共品;二是非户籍福利,包括城市基础设施、非正式的就业机会、秩序、信息、环境和文化等一系列非竞争性公共品。在第三个阶段托达罗模型改进中,建立在人口迁移行为决策的理性选择假设是家庭福利最大化,而家庭福利包括户籍福利和非户籍福利的总和。户籍制度俨然是以户籍性质和户口所在地为依据的权利界定和福利分配制度,它直接导致农村居民城镇化只能是“半城镇化”或名义上的城镇化,却不能真正享受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因此,消除与户籍相关的各种歧视和差别待遇,剥离户籍中隐含的各种公民权利和社会服务,建立以常住人口登记为基本依据的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城市管理制度是推进农村劳动力有效转移的政策选择。

(二)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推动农村土地产权流转交易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承包期内,如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允许其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如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并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如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强行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这意味着,农户将户籍转为设区的城市户口或非农户口,必须交回农村土地的承包权,甚至在某些土地稀缺的省份还要求交回宅基地。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冀研究员通过全国性调查数据统计分析发现:如果要求农户交出承包地,则有近90%的农户不愿意进城落户,其原因是农户想保留承包地和宅基地^[27]。尽管土地的种植收益在农户收入中所占比例不断下降,但对于他们来说,土地为他们提供了最后一道保护屏障,即“进城能打工,退守能种田”。同时,随着城市的发展农村土地开发的经济价值在不断提高,农户更不想放弃土地承包权所隐含的巨大经济收益。因此,国家关于农地制度改革的基本取向是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地位不动摇,并逐渐向追求效率的经济功能与赋予权利的保护功能让渡^[28]。

(三)增加农村教育投资,提升农村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

文化程度偏低和职业技能匮乏是困扰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的难题,也是制约农村劳动者城市融入的重要因素。伴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城市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对劳动者素质和技能提出更高的要求,农村劳动者在城市就业竞争中面临严峻的挑战,劳动力市场出现了“用工荒”和“就业难”并存的失衡现象。农村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较低,一方面会影响其城市就业能力和就业水平,另一方面会影响其城市融入和市民化过程。因此,提高农村劳动者的文化素质和人力资本水平是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融入的重要条件。

(四)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实现农村劳动力双向流动

城市化、城镇化是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的过程,是刘易斯模型所强调的劳动力转移的政策选择。与此相反,托达罗模型强调控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就地就业。无论刘易斯模型还是托达罗模型对劳动力转移问题只是看到问题的表面现象,而没有看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实质,其根本原因是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采取的“城市发展偏向”战略,更多借鉴了刘易斯模型的政策导向,由此带来了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单方向向城市集中。这种政策在短时间内带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和城市快速发展。但是,也造成了“大城市病”和农村的边缘化和空心化问题。因此,要改变要素的单向流动,促进城乡要素的双向自由流动,达到全社会资源要素的最

优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必须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它将成为中国未来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方向和新常态。

六、结论

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面对的核心问题,而作为劳动力转移的两大经典理论——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分别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劳动力转移政策选择,究其原因:其一,背景差异。刘易斯模型针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初期,农村生产力水平较低且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状况下,提出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要不断向城市转移,直到转移殆尽,最终完成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变。与此相反,托达罗模型针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特定阶段,城市出现大量失业且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并存的情况,提出了控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减少城市失业,实现农村劳动力就地就业。其二,视角差异。刘易斯模型是从宏观经济结构转换视角,分析发展中国家如何从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换,而实现这种目标的政策选择是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现代部门完成转移。托达罗模型则是从微观个体决策行为视角,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的差异,而这种预期收入差异越大,农村劳动力会流入越多的城市,并带来越来越严重的城市失业问题,其政策选择是控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其三,侧重点差异。刘易斯模型侧重点是解决二元经济结构和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问题;托达罗模型侧重点是解决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城市失业问题。

刘易斯模型与托达罗模型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改革开放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现象,但也暴露出两大理论模型的局限性。一方面,两大理论模型没有考虑发展中大国特殊的国情和制度因素影响,尤其是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复杂性和阶段性;另一方面,无论刘易斯模型还是托达罗模型仅仅看到劳动力转移的单一方面(农村生产力落后或城乡收入差异),实质上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动因在于城乡发展的不平衡。由此,针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复杂性和阶段性,并从我国城镇化过程三阶段的托达罗模型修正中获得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选择。

参考文献:

- [1] Lewis W A.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J]. The Manchester School, 1954, 72(5): 139-191.
- [2] Harris J R, Todaro M. Migration, un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 A two-sector analysi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0, 60(1): 126-142.
- [3] Nurkse R. Problems of capital foundation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87-88.
- [4] Editorial. Editorial[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e Change, 1952, 30(1): 3-7.
- [5] 高佩义. 未来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战略[J]. 经济学家, 1990(6): 43-53.
- [6] 胡景北. 刘易斯经济发展理论: 成就、问题和发展前景[J]. 社会科学, 2015(12): 40-49.
- [7] 周清杰. 低技能劳动力供给曲线研究[J]. 农业技术经济, 2004(6): 18-22.
- [8] 杨国才. 基于民工异质的刘易斯模型改造[J]. 技术经济, 2006(9): 58-61.
- [9] 刘勇. 二元劳动力市场供给的拐折模型分析[J]. 吉首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0(7): 95-98.
- [10] 赵显洲. 关于“刘易斯转折点”几个理论问题[J]. 经济学家, 2010(5): 75-80.
- [11] Todaro M P. 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ment countrie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9, 59(1): 138-148.
- [12] 迈克尔·P·托达罗. 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M]. 于同申,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 67-78.
- [13] Bahns K M. Rural-to-urban migr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Harris Todaro Model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the Chinese economy[J]. Dissertation, 2005, 67(5): 123-133.

- [14] 郭熙保. 发展中国家人口流动理论比较分析[J]. 世界经济, 1989(6): 38-45.
- [15] 伍向文, 沈薇. 托达罗模型的修正及其在中国的意义[J]. 开发研究, 2004(2): 52-55.
- [16] 朱熠. 析劳动技能对劳动力转移模式的影响——对托达罗模型的扩展[J]. 经济体制改革, 2008(1): 168-171.
- [17] 柯荣住. 城市人口控制制度及其变迁——迁移者与政府的博弈[J]. 中国社会科学, 2000(6): 26-36.
- [18] 李富有, 郭小叶, 王博峰. 户籍制度对农村劳动力流动趋势的影响分析——基于改进的托达罗模型[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2013(6): 152-159.
- [19] 陈会广, 刘忠原. 土地承包权益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托达罗模型的修正与实证检验[J]. 中国农村经济, 2013(11): 12-23.
- [20] 秦雪征, 周建波, 辛奕, 等. 城乡二元医疗保险结构对农民工返乡意愿的影响——以北京农民工为例[J]. 中国农村经济, 2014(2): 56-68.
- [21] 钟水映, 李春香. 乡城人口流动的理论解释: 农村人口退出视角[J]. 人口研究, 2015(6): 13-21.
- [22] 蔡昉. 劳动力迁移的两个过程及其制度障碍[J]. 社会学研究, 2001(4): 44-51.
- [23] 刘传江, 徐建玲. 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167-178.
- [24] 朱要龙. 土地依附效应与半城镇化事实: 对托达罗模型的修正与实证检验[J]. 产经评论, 2018(4): 140-153.
- [25] 邹一南. 户籍改革的路径误区与政策选择[J]. 经济学家, 2018(9): 88-97.
- [26] 于建嵘. 新生代农民工: 梦想如何照进现实[J]. 廉政瞭望, 2010(3): 50.
- [27] 张冀. 农民工“进城落户”意愿与中国近期城镇化道路选择[J]. 中国人口科学, 2011(2): 14-26.
- [28] 邓大才. 中国农村产权变迁与经验——来自国家治理视角的启示[J]. 中国社会科学, 2017(1): 4-24.

[责任编辑: 高 婷, 杨志辉]

The Negation of Negation: Comparison and Modification of Lewis Model and Todaro Model: A Study on the Policy Choice of the Transfer of Rural Labor Force in China

CHU Yongsheng, WANG Yunyun, GAO Di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China)

Abstract: Lewis Model and Todaro Model provide two opposite policy choices for labor force transfer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 reasons are as follows: Firstly, Lewis model is suitable for the early stag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hile Todaro model is suitable for the specific stage of urban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econdly, Lewis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cro-economic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alyses the process of labor transfer from agricultural sector to modern urban sector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hich is called “process theory”, while Todaro model analyses the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of rural labor transfer from micro-individual decision-making perspective, which is called “decision theory”. Thirdly, Lewis Model focuses on solving the problems that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brings, while Todaro Model focuses on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urban unemployment. The common defect of the two theoretical models is that the special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not taken into account in explaining the transfer of rural labor force, especially the complexity and phases of the transfer of rural labor force in China, a large developing country. Therefore, this paper tries to modify the Todaro Model from the variables of the stage of rural labor mobility, the decision-makers and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s, and proposes the policy options for rural labor transfer in China.

Key Words: Lewis Model; Todaro Model; dual economic theory; labor force transfer; urbanization; surplus labor force; Lewis turning-point